

安保罗生平经历及儒学研究略考

胡瑞琴

(鲁东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安保罗不仅是传教士,也是儒学家。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学可以相互交融,孔子与耶稣可以为友,他还独辟蹊径,将中国传统儒学经典“四书”从文言文翻译为“官话”,即“白话文”,开创了中国经典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先河。

关键词:安保罗;传教士;孔子;儒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5.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4-0021-05

德国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在19世纪30年代由郭实腊(Karl Gutzlaff, 1803—1851)开启的。80年代德意志帝国随着政权的日渐巩固和经济飞速增长,开始大规模抢夺海外殖民地。德意志帝国政治势力扩张也为德国新教传教团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884年同善会(Allgemeinen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n Missionsvereins, AEPM, 后改称“东亚传教会”)在魏玛成立。这是德国一个由持自由主义神学派和大学教授共同发起成立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差会,它的传教方法突破传统传教模式,不以设立传教机构为目标,而是派遣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通过文字和教育工作,向印度、日本和中国等文化民族中的受过教育者宣传基督教^{[1]108},以达到“文化传教”的目的。1892年来华的同善会传教士安保罗,不仅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儒学家。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中众多汉学家均是將中国典籍译为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而安保罗对儒学经典研究则以汉语为主,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将儒学四书的“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多年来,学界对于安保罗的生平、传教经历等知之甚少。笔者经多年多方的史料挖掘和整理,将其生平经历以及学术成就进行一番简洁梳理。不过,有些经历还需进一步详细考察,借此也求教学术界前辈和同仁。

保罗·克兰兹(Paul Kranz, 1866—1920),中文名字为安保罗,1866年3月13日出生于德国哈雷市古腾堡,1884年至1885年间,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哈雷、杜宾根、格赖夫斯瓦尔德等城市的几所大学接受神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牧师。1892年,他向德国同善会海外传教部提出申请希望到海外传教。1892年8月,他被派往中国。安保罗是继花之安之后第二个被同善会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1892年10月3日,安保罗到达中国上海。1893年,经由花之安推荐加入上海广学会,由于他深受倚重,此后一直都是广学会委员会的重要成员。1894年,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安保罗被推选为在上海的德国差会的执行委员^[2]。来华初期,安保罗就对中国学校教育倍加关注。认为教育问题将是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并强调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事务,应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求帮助。他从1869—1894年发表在《教务杂志》上有关教育的经典文章精选了16篇,涉及教会办学、女性教育、英语教学、课本编写、西方考试制度、中国经典、数学教学等方面。他主张应该尽快把这些经典文章汇集再版,目的是“帮助那些没有办法读到已出版的全部文章的社会较为底层的民众,可以有机

收稿日期:2020-05-26

基金项目: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晚清传教士安保罗诠释儒学经典的借鉴与启示研究”(19YJA730001)

作者简介:胡瑞琴(1965—),女,河北张家口人,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会读到这些有价值的文章”^[3]。他还特别关注中国妇女的缠足问题,1895年12月,安保罗还为来自英国的激进妇女运动人士阿博奇尔特·立德(Archibald Little)^①在上海组织的“天足会(Natural Feet Society)”运动起草英文宣传册,并由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将其翻译为中文^[4]。安保罗于1895—1897年曾担任过上海广学会的总干事^②。1897年随着德国政府在青岛开拓殖民地,同善会派遣花之安前往青岛负责开拓新的传教区。由于花之安身体欠佳,安保罗在1897—1898年间经常在上海青岛之间往返,和花之安一起承担青岛教务活动。1899年9月,花之安去世。同善会随即派遣卫礼贤来到青岛,负责青岛教会事务。之后安保罗就留在上海,不再参与青岛的教务活动。总之,安保罗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1910年,安保罗回到德国,1920年2月4日去世。

二

从德国同善会的传教理念看,由于起自自由派的神学家和大学教授,因此奠定了该差会浓厚的学术传教特色。在中国传教期间,安保罗用中文、英文、德文撰写了大量的儒学研究作品,安保罗的儒学研究精华主要反映在其阐论的三部著述中。

(一)《基督教成全儒教说》

189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救世教成全儒教说》(中、英文版),是安保罗首部研究儒学的著作。在汉语语境中,安保罗认为儒学思想中包涵着深刻的对于个体灵魂安身立命的道德超脱精神。1896年10月至1897年2月,他在《万国公报》上连续发表《基督教成全儒教说》长篇文章,后合辑出版。这本书前后销量达4万册。现在学术界对于安保罗的了解,更确切地说,在学术研究中提到最多的安保罗的儒学著述当属此书。在本论述中,他坦言:“中国目前之教,其名有四,即儒、释、道、回是也。释、道、回回三教之谬,显然易见,姑勿论矣。但即儒教而言,当何以处之?曰:救世教必欲成全儒教。何以成全之?曰:保守其善道,改革其差谬,弥补其缺憾而已。”^[5]¹³⁰ 作为传教士,安保罗这里所提出的儒教中所包含的善道、差谬、缺憾,主要是指反映儒学经典中如何看待上帝、如何看待个人、如何看待他人等三个层面。

1. 儒学中论上帝的善道与差谬。以基督教的神学视角,安保罗经过对儒学经典内涵的深入考察,认为儒书中关于上帝的描述到处都是,譬如,“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训》),“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尚书·汤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经·大雅·大明》),“皇天上帝”(《尚书·君奭》),“予畏上帝”(《尚书·汤誓》)等。他从“四书”中考究出“上帝”一词共有8处,从“五经”中整理出涉及“帝”和“神”的字句有145处^③。因此说明,中国人在古代是敬拜上帝的。同时又指出,儒学中的上帝观又有许多错漏之处。一是儒学中对上帝的认识不甚清晰。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虽然知道有上帝,但通常意义上,将“上帝”与“天”“鬼神”等具有崇拜色彩的词语尚未进行仔细鉴别,以至于人们敬拜“自然之天”或者“鬼神”,而忘记祭拜真正的上帝。二是尚未树立上帝独一无二的形象和权威。譬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尚书·泰誓》),“弗祀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尚书·泰誓》)。在这些经文中,虽然也知道有上帝,但是都没有指明上帝至尊无上的权威性和独一性。三是儒学中表现出多神崇拜的宗教特点。儒学六经中,不仅提到要敬拜上帝,也崇尚其他各路神圣。比如“怀柔百神”(《诗经·周颂·时迈》)、“遍于群神”(《尚书·舜典》),在安保罗看来,诸如此类的表达“皆谬误之最甚者”^[5]¹³²。当然,此处安保罗将中国古籍中出现的相当于“自然天”的“上帝”一语等同于《圣经》中译本中的“上帝”,完全是偷换概念。

2. 儒学中论个人的善道与差谬。安保罗认为,中国古人,凡是求学者,皆讲求修为之行,《中庸》之讲论具有束己之功,《大学》之讲论有省身之则,均倡导“慎独克己”,尤其儒学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更为其所推崇。他还认为,中国古代这些安贫乐道、舍生取义、君子之心,都表明了个

^①阿博奇尔特·立德(Archibald Little)女士是一位英国商人 之妻。1895年在上海发起“天足会”,1902年发起组成了“中国妇女天足会”这一全国性组织。见罗伟虹《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295页。

^②李提摩太写道:安保罗“在1895年秋到18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1896—18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并认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总是有满脑子改进工作的新点子。”详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③内容详见安保罗著、胡瑞琴整理的《四书本义官话·孟子本义官话》,齐鲁书社,2016年,第209—216页。

体生命对自我不断的修持和完善。倘若这些卓越品格推而广之,就可以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也”^{[5]131}。这些都是儒教中克己之善道。就自我修为而言,其错谬之处在于:作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虽然知道“善”为何,但是个体的自我还是不能“知善果行”,也就是说“见善而亦难必行”^{[5]134}。如果没有上帝的引导,“但有柔弱之心,而无刚强之气”,也是不能将所谓的“善”转化为行为以及产生出效果。

3. 儒学中论他人的善道与差谬。安保罗非常推崇儒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古人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并且用“忠孝悌忍善”为关系准则,认为这些均为值得推崇的人伦关系。但是他认为,儒学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并不准确和完备。从世界版图看,中国古人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随着东西方各国之间互通有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晓得中国只是“地球一隅之土”;从人伦关系看,中国古书中记录的父子相杀、生而不育、离妻娶妾等比比皆是的实例,以及历代宫闱之乱等,这些错谬的人伦关系都构成国家和社会的隐患和危险。

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安保罗作为传教士,还是本着善意查考儒学经典的,且将基督教和儒学在经文表述上相应的观念进行对比和诠释。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救世教亦犹医者之意耳,并无诋毁之言,实有匡扶之念。”^{[5]135}按照安保罗的说法,他诠释儒学经典的目的,既不是要诋毁儒学思想,也不是要废弃儒学经典,而是热心查证中国圣人贤哲的真理之道,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可以通过文化思想交流,以基督教的真理补足儒学思想之缺憾。

(二)《孔子基督为友论》

1914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孔子基督为友论》,是安保罗在华传教学习十多年后,对儒学创始人孔子及其论述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后形成的结论性成果。该著述篇幅虽不长,但其阐释的思想观点却尽显安保罗对儒学思想理解的独特视角。他提到,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曾对孔子表达其真诚之心时说:“余愈察孔子之言行,心志愈敬仰其为人。大哉!孔子参德造化学贯古今,圣训传统虽我基督教友莫不礼其书为紧要之课程。”^{[6]1}而他作为德国传教士,则设想说:“假若孔子基督同生于今世,余知二人必多友爱,不为仇

敌。”^{[6]1}他还特别提到犹太教的摩西是上帝拣选的在以色列国为基督做先导的人。同样,在中国,孔子是为中华帝国为基督做先导的人,认为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仁义之大端实在是“天下共喻之金箴”^{[6]2}。

1. 孔子的宽恕之道。安保罗认为,孔子提倡先正己而后正人;诚意正心;不道人恶,以义以礼以逊以信;日日新,等等,这些日常言语行为之教化高超远道,与基督教教导人的伦常之道都是相合而不相背的。

2. 孔子的宗教意识。安保罗认为,在孔子的讲论中,常常提到:君子“畏天命”(《论语·季氏》)、“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获罪于天,无所祷矣”(《论语·八佾》)。孔子的这些言论,虽没有直接用到“上帝”一词,不过,以此可知孔子认为“天鉴至明,不是无灵之物”^{[6]3}。安保罗认为,孔子之所以以“天”代替“上帝”,是出于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双重考量:一是因为当时道教刚刚盛行,并创造“五帝”之虚传,恐怕与真上帝相混杂;二是因为当时惟有天子才能敬拜上帝,故孔子不敢僭越,所以代之以“天”,“四书中或称为上帝或称为天,交相互称,名不同而意同一”^{[6]4}。所以,安保罗认为孔子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情怀。

3. 孔子的先知之性。安保罗认为,孔子真诚之善道与基督的教导相融相同,并举例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说“摩西并施洗约翰与以色列民为基督先导者,苏格拉底并柏拉图与希腊人为基督先导者,似启蒙之师,引导伊至基督”,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如此皇天上帝亦与华民赐一位大先导者,即孔夫子以引导华民至基督”^{[6]7}。也就是说,孔子如同摩西与以色列民众和苏格拉底与希腊民众一样,是上帝在中国民众中设立的先知。安保罗还指出,做百姓之先导,“此是孔子最尊最高之任,此是所以孔子基督为友也”^{[6]7}。

安保罗对称为东方圣人的“孔子”与被基督教称为上帝之子的“耶稣基督”进行对比分析,明确指出孔子是上帝设立在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知。安保罗认为,任何一种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都具有追求真理和生命意义的诉求和价值,其学说的创立者也往往具有超然意识和引导作用,在中华民族具有先知先觉特征的人物之一就是孔子。当然,安保罗将孔子视作“上帝”在中国设立的“先知”,体现了其试图将中国儒学纳入西方基

督教文化体系之中,这一表现完全是由其传教士身份决定的。

(三)《四书本义官话》

最能体现安保罗儒学研究成就的当属《四书本义官话》。1904—1906年安保罗在上海威海卫路的寓所用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将“四书”从“文言文”文本翻译为“白话文”文本。他最先翻译成的是《论语本义官话》,完成时间在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第二本是《中庸本义官话》,完成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第三本为《大学本义官话》,完成时间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05),两本编辑在一起,合称为《学庸本义官话》;第四本为《孟子本义官话》,时间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明清时期,在欧美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传教士汉学家,如明朝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学者利玛窦、柏理应等以及晚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理雅各、卫礼贤、顾赛芬等均是“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翻译为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等,而安保罗则是将“四书”翻译为中国“官话”,即“白话文”,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安保罗译著的《四书本义官话》开创了儒学经典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先河。其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中国数千万的孩子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儒学经典,并认为教育这些孩子们“必要用一个新方法”^{[7]序言}。其实,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1906年清政府正式发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停止。”^{[8]卷195}至此,自隋朝大业元年(605)起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封建政府选拔文武百官及后备人员的科举制度,经历了一千三百年最终被废止。安保罗之所以在此时提倡“儒学经典教育”似乎显得很不合时宜。但是,他并非不了解清末教育之时局,而是可能出于他对中国经典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清晰思考,认为儒学经典中“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对人形成高贵品格的基本生命成长诉求^[9]。其翻译的目的是希望在基础教育学校中让儒学经典教育真正地落到实处。他认为,中国学校教育改革不是要排斥或抹杀儒学经典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在新时代应用新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经典学习。

在《四书本义官话》中,安保罗诠释方式是以白话文翻译为主,并在部分经文中辅之以《圣经》经文相互对照解释。他采用的这种对读的方式,

也较为客观地体现了他的传教士的身份,既有其不能摆脱的宗教信仰情怀和本身所具有的神学立场,也有对一个人生命养成道德品行过程中应该具备的经典传承和文化教导的深刻关怀^{[10]序言}。当然,从一定意义上也表达出,他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起了超文字意义的基督教“他者视域”和儒家伦理“内在道德”对话新模式。近代著名儒学家张君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当中国高呼‘打倒孔家店,打倒旧文化!’的时候,外国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却在觉醒。”^{[11]2}

1924年,在华传教士在湖南圣经学院召开了一次“圣经会议”,其中有一个主要的议题,即讨论“中国人祖先崇拜的意义”,本次会议特别从1878—1914年36年间,选出了45位在该论题阐述中比较有影响的人,其中就包括安保罗^{[12]59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安保罗撰写的文章能够深入中国儒学的核心内容并具有相当的深度。

三

与久居中国的一些英美传教士相比,安保罗来华时间并不算很长,但他却历经了中国历史上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义和团运动起落、科举制度废除、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时刻关注着世界与中国的风云变幻。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如何让中国人尽快尽早地“心归耶稣”。他秉承前辈花之安的做法,试图在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基督教与儒学中的圣贤之道“相互联盟”,引导中国人投入基督教阵营中。同时,安保罗也不希望在中国的学校废除儒学经典的教导,目的是试图通过学校的经典教育,让中国人尤其是“小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实学”,并掌握为国家服务的本领^{[7]序言}。安保罗在传教和学术研究中,秉承了德国式的细致、坚韧与大胆创新,倡导一种更为自由开放的福音传播方式——耶儒“相互联盟”。这种认识维度,具有对中国经典认识过程中的两面性特质:一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名西方传教士们普遍拥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强势心理,安保罗认为“孔子若复生于今世,闻永远之上帝,由基督之体显见其荣耀并救人之恩,宣扬永生之真道,孔子岂能不降心相从,尊奉基督为己所仰慕之圣者乎?”^{[6]8}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位儒家学者的身份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经典形成了深刻见解。当时也有一些传教士认为安

保罗在基儒经典对话之间表现出的“共同体意识”太过前卫,走的太远,为此还备受争议^{[13]614-615}。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保罗的儒学观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接纳,尤其是那些来到非基督教的“异教徒”社群中移植基督教文明的人。

参考文献:

- [1] 孙立新. 近代中德关系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 The Chinese Recorder[J]. Vol. 25, June, 1984.
- [3] The Chinese Recorder[J]. Vol. 26, June, 1894.
- [4] The Chinese Recorder[J]. Vol. 26, Nov. , 1894.
- [5] 李天纲. 万国公报文选[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 [6] 安保罗. 孔子基督为友论[M]. 上海: 美华书馆, 1914.
- [7] 安保罗. 孟子本义官话[M]. 上海: 美华书馆, 1910.
- [8] 朱寿明. 光绪东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9] 安保罗. 圣经要道[M]. 上海: 美华书馆, 1896.
- [10] 安保罗. 论语本义官话[M]. 上海: 美华书馆, 1910.
- [11] 孙立新, 蒋锐. 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
- [12] The Chinese Recorder[M]. Vol. 55, Sep. , 1924.
- [13] The Chinese Recorder[M]. Vol. 29, Dec. , 1898.

Paul Kranz's Life Experience and Confucianism Research

HU Ruiqi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Paul Kranz was not only a missionary of German Weimar Mission, but also a scholar of Confucianism, believing that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could be mutually blended, and that Confucius and Jesus could be friends. He also invented a new way of translating “The Four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to “Mandarin Language” (“writings in vernacular”), which pione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from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to writings in vernacular.

Key words: Paul Kranz; missionary; Confucius; Confucianism research

(责任编辑 雪 箫)